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论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域

赵福生

(黑龙江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马克思哲学一直被人们误认为只有宏观视域没有微观视域, 以致常常被误读为宏大叙事、整体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但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到马克思的文本就会发现, 无论是存在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维度, 马克思哲学都有其微观视域。事实上, 马克思已经展开了微观经济分析, 开启了微观史学, 敞开了微观权力视域。阐明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域, 对于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消除人们对于马克思的种种误解, 彰显哲学的本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 微观视域; 福柯

作者简介: 赵福生(1971-), 男, 黑龙江桦南人, 黑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 黑龙江省委党校教师, 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504(2008)01-0036-06 **收稿日期:** 2007-10-20

长期以来, 马克思哲学一直被人们误读为宏大叙事、整体主义和经济决定论。这与人们误认为马克思哲学只有宏观视域, 而没有微观视域的观念密切关联。然而, 深入的研究将发现, 马克思已经从微观经济、微观史学、微观权力三个方面向人们敞开了微观哲学视域。

一、微观经济分析的展开

马克思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微观叙事, 并在微观叙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总体叙事。不了解马克思的微观叙事, 不了解总体叙事的微观基础, 就容易将马克思哲学误读为宏大叙事。

马克思哲学是从微观叙事开始的, 这种微观叙事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它叙述的人不是一个大写的存在, 而是一个小写的、具体的存在。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人既不是笛卡尔的我思的主体, 不是黑格尔的精神, 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 而是生活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的具体人群。其次, 它叙事的方式, 既不是传统意识哲学的抽象方式, 也不是具体科学的实证方式, 而是一种新的方式, 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就是对实证科学的对象作历史的和社会功能的哲学考察。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 马克思就将自己的哲学关怀指向日常生活中的微观人群, 也就是工业社会的弱势群体——工人群众。他要考察的是, 作为社会推动力量的工人是如何落到边缘地位的。这种考察把马克思的目光引向实证科学的典范——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命名”了工人, 以“科学”的形式确定了工人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 但是,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发现, 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蕴含着一种抽象化的哲学。这种抽象化表现为“拟动物化”策略, 即把人转变为牲畜。在国民经济学中, 工人被抽象化为“经济人”, 这种抽象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 生活的工人被抽象为劳动过程

中的工人。斯密的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它只考察劳动时的孤立的工人个体。第二，工人是完全被动的个体，他受动于经济需要，从属于经济系统，他的存在仅仅相当于经济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相当于工人牲畜般的存在状态下的最低工资。因此，马克思批判说：“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P15)}。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工人完全像一头牛或一匹马，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第三，工人是理性的，他的非理性方面完全被国民经济学割除了。国民经济学“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来做”^{[1](P14)}。

国民经济学的的问题在于：以科学的面目，以理论的形式，把人转变为非人，把主客体统一的存在转变为纯粹客体性存在。而国民经济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悬置了自身的前提。“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P50)}如果把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视为理所当然，那么工资理论看起来就具有合理性：工人的贫穷不在于别的原因，而在于他没有私有财产。因此，要想改变工人的生存境遇，恢复工人的主体性地位，就必须冲破国民经济学的迷雾，就必须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而批判国民经济的前提，就必须从工人的现实劳动事实出发，来探寻私有财产的根源，其结果是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诞生。马克思指出：“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P3)}

“异化劳动”思想是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关于工资、地租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在异化劳动阐述中，劳动者已经由工人扩展到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不再是国民经济学视域的个体的、被动的、被安排的、动物的存在，而是异化劳动视域的群体的、互动的、创造着的、劳动着的、感性的、异化的存在。分工和物化产生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产生使劳动者的产品与劳动者本身相异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工人何以成为现代社会的边缘存在。如果忽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的分析与异化劳动的关联，不了解“异化劳动”思想形成的微观基础就可能陷入“异化劳动”是“抽象历史观”、“不成熟阶段”、“宏大叙事”等论断中。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一方面源于他对国民经济学的走入，另一方面源于他的哲学背

景和立足点。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荷载了一种新哲学，这种新哲学超越了国民经济学中蕴含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和方法论的意识哲学。这种新哲学就是建立在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的实践哲学。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哲学给予很高的评价。费尔巴哈哲学使人成为自身唯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费尔巴哈对“人”的发现为从微观上颠覆国民经济学的“拟动物化”策略提供了哲学前提，为把活生生的人从其他劳动要素中突显出来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把对国民经济学的微观批判与费尔巴哈哲学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关于“实践”的最初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人赖以生存的无机界时指出：“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1](P56)}这既表明了人是现实的、生活的，而且表明实践在马克思那里的最初含义是人的生活 and 活动。这种关于实践的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为“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活动，人的主体的方面”。马克思将微观经济批判中形成的实践观点具体到对社会生活的分析之中。他强调：“社会生活本质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P56)}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展开全面哲学运思，形成了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视域。这其中，马克思不仅把实践观点运用于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分析之中，而且也扩展到对人类历史的分析之中。

二、微观史学的开启

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应用到历史分析之中，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他建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也是批判传统宏观史学的过程。

首先，马克思关于历史对象的阐述，批判了传统宏观史学的存在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2](P93)}。换句话说，传统宏观史学所指称的存在不是相应历史时期的现实存在，现实存在的日常生活往往被宏观史学家置之度外，传统史学家的视域要么停留在日常生活之外，要么停留于日常生活的表层。在他们的视域中，要么是把现实之外的精神作为历史的存在，要么把古代帝王的思想作为历史的基础。这是将

外在于世界之物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的做法，是一种历史观上的基础主义。

其次，马克思关于历史内容的阐述，批判了传统宏观史学的认识论。传统史学认识论存在很大的问题，“他们根本不提一切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干预，为此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而是以虚构和文学闲篇为概括”^{[2](P96)}。宏观史学不去认识丰富的历史事件及其意义，只倾向于以虚构和文学闲篇来书写历史的精神本质。这是一种历史观上的本质主义。

再次，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因素的阐述，批判了传统宏观史学的方法论。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反对传统宏观史学的整体主义的或还原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把历史发展因素理解为机械的部件，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在于：第一，它假定它所指涉的时空范围内的全部事件之间具有同质性，这些事件遵循同样的因果关系。第二，它假定历史发展是由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心理性情、技术习惯、政治行为这些社会要素同步整体地发展。第三，它假设历史发展路径是线性的和连续的。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历史观是机械的历史观，从本质上看，属于唯心史观。还原论的问题在于它认为，一个社会的全部差异都可以被还原于某一种要素、某种世界的结构、某一价值系统的建立或与某种文明相一致的类型。这种还原论将历史的“杂多”绝对地抽象为“唯一”；它的本质也是唯心史观。

马克思以实践观点来分析历史，认为历史是现实的生产实践的历史，是日常生活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在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各种历史因素往往不同步、不均衡地发展。然而，传统的历史观不懂得实践的辩证法，要么把一切还原为机械，要么把一切还原为精神。这种历史观实质上都是以一种主体之思来统一历史，因而遮蔽了市民社会、日常生活、政治活动和道德伦理实践的丰富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开启了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向，这一转向改变了史学的语法结构。传统史学的语法是动词“是”(be)，“历史是某物”，因此历史是封闭的，是必然的；现代史学的语法是连词“和”(and)，“历史某物和某物……”，因此历史是开放的。传统史学的结构是旧的“三位一体”：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和还原论，而现代史学结构则是新的“三位一体”：内在基础、多样事实、微观活动和实践论。马克思的史学转向的意义深远，它由抽象向现实的转向导致了“日常史”和“社会历史学

派”的诞生；由“一”向“多”的转向导致了“长时段史学”的诞生；由宏观向微观的转向导致了“微观史”学派的发展。法国思想家福柯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他说：“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3](P12)}。

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史学建立实践的历史观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使用“微观史学”字眼，没有将微观史学主题化，但实践的历史观已经蕴含着微观史学视域。而且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展开了一种对经济史的微观分析，比如，国民经济学把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主体等同于农业社会中的牲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等同于封建社会的地租，这种经济史无疑是线性的历史观或者静止的历史观，于是私有财产的历史成为永恒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不同于农业社会中的牲畜，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地租，工人也不同于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连续与间断的辩证法。

马克思还在《手稿》序言中提出，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1](P3)}。然而，马克思终生没有实现这个计划。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这一计划与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恩格斯对此作出了回应。在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中，恩格斯提出：“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4](P726)}。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承认，马克思只是在基本经济事实的阐述中，在基本经济事实的问题域内论及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及其实践的内容。马克思并没有对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产生的方式和方法展开微观研究。至于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恐怕与马克思哲学的使命有关。马克思哲学是革命的哲学，这个哲学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提供解放的思想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形势和任务可能使马克思没能来得及对上层建筑作更多更微观的分析。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微观研究的缺乏是“不足”，甚至是“过错”，因为这样“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

歪曲”。事实的确如此,19世纪70年代末,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马克思派”就曾曲解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对“马克思派”的回应。不过,大约100年后,“马克思派”的后人福柯批判了他们割裂马克思的做法。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认为,19世纪末,“在文化整体性的主题中人们先是批判了马克思,然后又为他乔装改扮”^{[3](P15)}。文化整体性的主题,旨在恢复主体性和人类学。为此,他们对马克思哲学作了如下分解:首先,这种研究把马克思历史观还原为“经济决定论”,认为马克思对经济规律的强调忽略了主体性,而将历史发展归结为与人无关的“物”。其次,这个研究又把马克思学说人本化,“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学家,并在他的论述中重新找出人文主义的言论”^{[3](P14)}。他们先将马克思提出的辩证的历史还原成“全面历史”,再把它转变成“整体性”的历史,然后,以“马克思”的“整体性”的历史,来攻击“马克思”的“全面历史”,殊不知,“全面历史”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还原论的历史观,“整体性”的历史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机械的历史观。所以,他们批判的那个“马克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而是被他们自己构造和扭曲了的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进行的实际是自身对自身的批判。

虽然马克思没有单独分析法、道德、政治的历史,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得到更为精致的展开,其中很多思想后来成为福柯、哈耶克等人微观批判理论的资源。

三、微观权力视域的敞开

马克思哲学不只在19世纪被人误读为“经济决定论”,20世纪西方哲学界也倾向于对马克思作同样的解读。比如,法国学者拉法格(P. Lafargue)就直接把“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作为自己《思想起源论》一书的副标题。毋庸置疑,马克思强调经济的基础作用,但是,他也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经济系统的反作用。关于这种反作用,马克思主要涉及了三个主题:一是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二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三是协作、监督等活动对经济的反作用。

首先,马克思强调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共产党宣言》通篇体现着这一思想。恩格斯则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阐明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反作用的三种具体方式。

其次,马克思从不同角度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姨妈”是新教伦理的发言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以为自己的手艺为真的原因。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马克思指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P611)}作为意识形态散布系统,传统和教育将原则化的阶级情感和观点内化到人的心里,这些情感和观点对于这些个人来说,容易成为一种“非思”,一种集体无意识。当人们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为真时,这些情感和观点会以强大的力量推动包括人的经济行为在内的全部行为。马克思认为,必须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他计划“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P92)}。然而,如前所述,马克思并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工作。福柯在自己的知识考古学中所做的工作,实际上追溯了宗教、哲学、道德产生的过程,把人们以为理所当然的宗教、哲学、道德“问题化”(problématisation),不仅如此,福柯还把“问题化”策略拓展到精神病学、人文科学、知识、监狱、性和主体之上,形成知识考古学思想。

再次,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了生产空间的被分割和生产时间的被组织,在大工业的新时空中,展开着协作、纪律、监视等活动。这里的分析已经触及到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微观运作机制。因此,被福柯明确地引用。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在阐述“规训的手段”时引用马克思的话:“一旦受到资本控制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管理、监督和调节的工作就变成资本的一个职能。一旦成为资本的职能,它就获得了特殊的性质”^{[5](P199)}。这表明:首先,马克思强调了监督、管理和调节工作对生产的意义。其次,马克思强调,一旦成为生产要素,监督等活动就获得了特殊的性质。这个“特殊的性质”是什么?在引用马克思的话之前,福柯写道:“监视就变成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活动因素,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特殊的性质”在福柯这里即规训权力。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福柯何以认为,监督获得的特殊性质就是规训权力呢?这是不是一种独断论呢?深入到马克思文本中,就会发现福柯对规训权力这一理解的来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关于协作的阐述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把监督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

人”，监督工作被固定为这些人的专职，而监督工作所花费的费用不算作生产费用。在这里，传统军队中的监督职能进入经济生产，并且从资本权力中分化出一种社会性的权力，这种权力掩盖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直接对立，监督的这种特点和优点使之迅速地扩散。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只要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因而为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共有”^{[6](P510)}。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提到了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对学徒的监视。那时，监督还只是一种有限的服务于师傅的经济利益的技术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凡是存在着分工与协作的有组织生产，都必然会产生监督行为和监督职能，监督已经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一方面，监督、调节等手段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由于监督已经由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监督就成了资产阶级掩盖阶级对立的障眼法。这种障眼法的有效性和隐蔽性，使得本来就属于政治生活一个微小职能具有了向社会日常生活全面进军的可能，而资本主义使得这种可能成为现实。除了监督外，马克思还多次强调了劳动分工、协作、乐队和军队等组织之间的相似性。在马克思的这类论述中，已经蕴涵着监视的二重性。一方面，监视具有生产力性质，具有经济性，它以管理的形式优化了其他生产要素的结构，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监视具有广泛的微观政治意义，不仅存在于劳资之间，而且存在于一切组织与个人之间。现代工业社会使二者空前地结合起来，使这种监视越来越隐蔽，越来越温和，却越来越有效。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所宣扬的18世纪以来的与社会权利、法律公正、人人平等相联系的宏观权力的进步历史不过是一种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效果历史”。事实上，宏观权力是由监视、纪律等细小的、日常的微观权力来支撑和维持的。统治并没有被取消，而是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只是在阐述资本生产规律范围内的“副产品”。马克思早在《手稿》中指出：“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1](P3)}

马克思关于监督的微观分析被福柯从三个

方面丰富和发展：一是视野的扩大。空间的被分割和时间的被安排已经从工厂、军队扩展到全社会。在监狱、学校、家庭等几乎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监督、纪律全面展开；二是理论的主题化。马克思的法律政治权力、资本社会权力和监督技术权力被划归为“宏观权力学”和“微观权力学”的研究对象；三是领域的转换，马克思对监督、管理等技术考察集中在经济分析层面，福柯的研究则明确地将它们拓展到科学、话语、道德、教育等社会文化分析层面。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关于监督的阐述中蕴含着监督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空前地联系在一起。站在这个高度，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经济决定论的做法，就不仅仅是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说的“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而且不了解马克思对上层建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视马克思哲学的微观视域，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割裂开来。

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传统史学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主题化，但是已经在事实上从三个维度开启了哲学批判的微观视域。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哲学运思蕴涵着一个不断“走入—走出”的过程：他走入实证科学，又走出实证科学；他走入微观分析，又走向宏观分析；他走入具体人群，又走向全人类；他走入微观史学，又走向总体史学；他走入异化社会，又走向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没有哲学”，而是马克思的旨趣不在于构造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马克思才在《费尔巴哈提纲》中说出那样振聋发聩的话：“以往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2](P57)}。解释世界依靠的是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改变世界依靠的是实践。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而不是“宏观知识体系”，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哲学编织成知识体系，而应关注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分析、微观史学开启和微观权力探索上所作的尝试和努力，还马克思一个完整的哲学，还哲学一个完整的马克思，恐怕是不容我们回避的。哲学向我们表明，其运思就像德里达所说的幽灵一样，其本性就在于不断走入—走出。对哲学来说，走入是为了使哲学问题得以明确，走出是为了超越体系的封闭。对哲学家来说，走入是使生命更加现实，走出则是使生命超越形式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意识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共同的弊病就在于只有走入，传统意识哲学走入宏观视域，而没有走出宏观视域，所以陷入抽象化、体系化；后现代哲学走入微观视域，却没有走出

微观视域,所以陷入断裂化、破碎化。我们说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就在于马克思不断地走入一走出,就在于微观哲学视域与宏观哲学视域的结合,这是多与一结合,是客观与主观结合,这表明马克思深谙并突显了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使命。因此,马克思哲学能冲破学科形式的束缚,穿越所有社会文化领域,穿越人类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整个后马克思时代来说,马克思是不可绕过的。

马克思既给我们提供了宏观的哲学视域,也向我们敞开了微观的哲学视野,然而,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微观哲学分析。因此,放眼世界,对当代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展开马克思未竟的微观哲学分析,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重任。展望中国,在马克思的宏观思想指导下,对中国的现实生活作微观分析,创造性地展开微观哲学视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面临的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3.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03.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

On Marxist Micro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ZHAO Fu- she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It is a mistaken idea that Marxist philosophy only contains macro perspective but no micro one. It is misunderstood as grand narrative, holism, and economic determinism. However, if we prone into the text of Marx, we can find that no matter existentialism, epistemology or methodology, they all contain the micro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In fact, Marx has already carries out micro economic analysis and initiates micro historiography, resulting in the opening up of micro power perspectiv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xpound Marxist micro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Marxist philosophy, get rid of some misunderstanding of Marx and clarify the nature and spirit of philosophy.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micro perspective; Foucault